

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

任志江¹ 刘雨薇² 邓惠³

[内容摘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先后探索出五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其中,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独特创造。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全面学习苏联工业化方法的“舶来模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是试图将苏联工业化内核与我国资源优势和现实需要相结合的理想建设路径。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化道路,是通过与一般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文明发展方向进行契合对接以确保在与人类共同价值目标融合的过程中实现我国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道路,是根据新阶段、新矛盾、新目标、新任务而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架构、战略部署、布局安排等进行创新升级的结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现代化道路;百年历程;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21)06-0053-14

作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全面系统的社会变革,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最不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1]正因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近代以来的所有革命,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归根结底也是为了通过革命创造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于实践中不懈探索适合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从而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过程。值此建党百年之际,对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艰辛历程进行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相关经验启示,对刚刚开启的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简介:任志江(1976—),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电子邮箱:304663580@qq.com。

刘雨薇(1989—),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生。电子邮箱:1161202Z@smail.swufe.edu.cn

邓惠(1996—),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电子邮箱:835339776@qq.com。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2019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思想的历史由来与经验启示研究”(19YJA710032)、

(C)1994-2020年四川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四川乡村治理制度创新研究”(SC20ZD010)的资助。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表1 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道路百年历程的相关情况

道路类型		新民主主义 现代化道路 (1921—1952年)	过渡时期 现代化道路 (1953—1956年)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现代化道路 (1957—1978年)	改革开放新时期 现代化道路 (1979—2012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现代化道路 (2013—2021年)
道路 基础	1. 总体依据	新民主主义 基本纲领	过渡时期 总路线	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路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本路线
	2. 具体理论	新民主主义 工业化理论	苏联工业化 理论	苏联工业化理论的 中国化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新发展理念
	3. 建设目标	由农业国变 工业国	由农业国变 工业国	由三个现代化到 四个现代化	现代化	全面现代化
道路 主体	4. 建设载体	“十年建设”或 “二三十年”等	“一五”计划	由“大跃进”先后 变为备战计划、“洋 跃进”	由温饱先后升级为 总体小康、全面小康	由全面小康向基本现代 化升级
	5. 建设重点	农业、轻工业	重工业整体	由“以钢为纲”先后 变为国防军工、基 础工业	由劳动密集型升级为 资本密集型产业	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 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升 级
	6. 建设路径	国营大工业、私 人资本、合作经 济共同发展	中央大中型 企业扩张	一系列并举的 “两条腿走路”方针	“两个大局” 发展思路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 展格局
	7. 建设动力	“四面八方”	“三大改造”	拔高生产关系 和进行阶级斗争	市场化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8. 资源特色	利用外资	苏联援助	通过群众运动 用劳动力进行替代	由引进吸收 走向自主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9. 推进方式	外延粗放型	外延粗放型	外延粗放型	由外延粗放型向 内涵集约型转变	内涵集约型
	10. 体制依托	新民主主义 经济体制	向计划经济体制 的集权模式过渡	计划经济体制的 分权模式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11. 经济成分	多种所有制并存	向单一公有制 过渡	单一公有制	多种所有制并存	多种所有制并存
	12. 分配方式	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	向单一按劳 分配过渡	单一按劳分配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道路 保障	13. 资源配置	直接计划、间接 计划与市场调节 相结合	向中央指令性 计划过渡	中央与地方的 指令性计划	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14. 对外关系	独立自主基础上的 对外开放	“一边倒”	“反两霸”	由政策性开放走向 制度性开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5. 区域政策	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	由非均衡向 均衡发展转变	协调发展
道路 绩效	16. 经济增速		快速增长	相对慢速增长	快速增长	中高速增长
	17. 经济波动		高位/平缓	低位/大起大落	高位/平缓	高位/平缓
	18. 产业结构		比较协调	严重不协调	比较协调	比较协调
	19. 生活水平		贫困	贫困	由贫困先后升级为 温饱、总体小康	由总体小康升级为全面 小康
	20. 发展质量		高	低	高	高

一、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1921—1952年）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完成国家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为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党就对如何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实现现代化进行了持续探索，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

特定的历史阶段、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务实的工作态度，使这一道路在基础、主体、保障方

面呈现出以下15点内容：(1)在总体依据上，以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为总依据；(2)在具体理论上，以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理论为具体指导；^①(3)在建设目标上，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4)在建设载体上，先后由“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变为“一二十年时间”“二三十年”“十年建设”等；(5)在建设重点上，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6)在建设路径上，主要靠国营大工业、私人资本、合作经济共同发展；(7)在建设动力上，通过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照顾“四面八方”的利益；(8)在资源特色上，外国投资是资金来源之一；(9)在推进方式上，总体呈现出外延粗放型特征；(10)在体制依托上，依靠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保障经济运行；(11)在经济成分上，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个体、私人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12)在分配方式上，与所有制结构对应，多种分配方式并存；(13)在资源配置上，直接计划、间接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4)在对外关系上，主张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对外开放；(15)在区域政策上，要求均衡发展。

除上述构成与特征外，对这一道路还应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凝聚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不仅规定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性质和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方向，还在抗战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初步实践中验证了其科学性与有效性。1940年，毛泽东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他进一步将其与党的基本纲领联系起来进行具体论述。在此基础上，他又于1947年提出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事实上，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进一步展开，为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指明了方向。也就是说，这一基本纲领不仅规定了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性质和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方向，还在根据地、解放区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中进行过初步实践。这些实践结果表明，这一基本纲领符合我国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基本国情，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确保了各阶段革命的成功和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充分证明其科学性与有效性，从而从根本上确保了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第二，基本经济制度与基本国情的一致性，是确保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正确性与可行性的关键环节。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我国当时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基本国情相适应，能有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正因如此，毛泽东才于1945年指出：发展资本主义“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所以，一方面“要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另一方面，“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②这种立足于基本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确保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正确性与可行性的关键环节。

第三，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是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显著特色。资本短缺和劳动力过剩，是近代以来我国资源禀赋的主要特征和现代化起步的首要难题。为破解这一问题，我们党提出，通过积极引进外资来解决现代化启动资金的大胆设想。为此，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

大上指出：“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⑧为落实这一精神，中央还通过相关文件作了具体规定。如为吸引外商到解放区投资，在《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中规定：“应采取直接与美国及英法等国政府及其个别商人进行经营合作的方针”“吸收外资来开发山东的富源，建立工厂，发展交通，进行海外贸易与提高农业和手工业”。^⑨不难理解，积极引进和利用外资政策的提出，不仅在于提出了解决现代化启动资金短缺问题的出路，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开放的、与世界现代化接轨的新路。^[2]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这一特点，显然不同于后来所选择的在封闭环境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苏联工业化模式。

虽然由于后来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其他多种原因，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被放弃了，但这一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理论成果，不仅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二、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1953—1956年）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条件的具备，党中央根据现实情况和实际需要对此前的构想进行了修改，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全面学习苏联工业化模式，由此践行了我国第一条现代化道路——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

特殊的时代背景、内外环境和运行机理，使这一道路在基础、主体、保障、绩效方面呈现出以下20点内容：（1）在总体依据上，过渡时期总路线取代了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2）在具体理论上，以苏联工业化理论为具体指导；（3）在建设目标上，依然是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4）在建设载体上，主要体现在“一五”计划上；（5）在建设重点上，效仿苏联开始优先发展重工业，并比较注重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平衡；（6）在建设路径上，学习苏联通过中央大中型企业扩张来实现工业化；（7）在建设动力上，由“四面八方”变为“三大改造”；（8）在资源特色上，苏联援助起到“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⑩（9）在推进方式上，体现为外延粗放型特征；（10）在体制依托上，由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苏联式中央高度集权型体制过渡；^[3]（11）在经济成分上，由多种所有制并存向单一公有制过渡；（12）在分配方式上，由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向单一按劳分配过渡；（13）在资源配置上，向中央指令性计划过渡；（14）在对外关系上，开始走上“一边倒”的道路；（15）在区域政策上，实行均衡发展；（16）在经济增速上，实现了快速增长；（17）在经济波动上，呈现出“高位/平缓”的特征；（18）在产业结构上，比较协调。

除上述构成与特征外，对这一道路还应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对苏联式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选择，必然派生出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和以实现这两者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重工业投资规模大、技术要求高、周转时间长等特

征，与我国当时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为此，我们党效仿苏联的做法，通过对制度变革来营造适合这一现代化道路的资源配置制度、宏观政策环境和微观经营机制，^[4]于是就使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经由“三大改造”逐步过渡到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苏联式中央高度集权型体制。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毛泽东在国民经济恢复前后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转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第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生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现代化道路的不科学性。首先，过渡时期的起点存在矛盾。一方面，根据总路线的表述，过渡时期的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⑤这就意味着，新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上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但我们党过去一直认为“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⑥所以，如果这种直接过渡的新认识能成立的话，那我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就有问题了。另一方面，根据当时党中央引用列宁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提法，^⑦和毛泽东此后多次提到“中国实现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均意味着过渡时期的起点是资本主义。但我国历史上并未有过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这是造成总路线和这一现代化道路存在隐患的深层原因。^[5]其次，“主体”与“两翼”之间存在矛盾。毛泽东将总路线的“一化三改”任务比喻为鸟的主体和两翼，希望通过拔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发展。事实上，这也是提出“总路线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⑧这一论断的根本原因。这种违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做法，不仅造成1953年和1956年两次急躁冒进，也导致后来出现“两翼先飞、主体滞后”的结果。

第三，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学说的错误理解，是造成前苏联工业化模式和这一现代化道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理论原因。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列宁将科技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纳入研究视野，得出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必然比制造消费品的那个部门增长得快”的结论。^⑨这就意味着，在扩大再生产中，不仅生产资料的增长要比消费资料的增长更快，而且这种增长也必须与两个部门所需增加的生产资料保持适当的比例。然而，斯大林却曲解了上述经典作家的原意，将这一学说发展为“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是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规律”。显然，这就会造成一种绝对化的认识，即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可以不受科技水平和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制约。事实上，这是导致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长期以重工业优先发展观为指导的深层理论原因。虽然“一五”计划期间我国竭力保持各产业间的综合平衡，但由于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注定了这种平衡必然是勉强和脆弱的。正因如此，“一五”计划从一开始就受到农业、轻工业等发展滞后的影响，并在实施中变的日渐严峻。

不难看出，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实质上是一个兼具历史局限性与客观必然性的全面学习苏联工业化道路的建设模式。^[6]由于在资源配置方式过渡中市场作用衰减的渐进性，加之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重视经济关系与产业结构的基本协调，所以“一五”计划能够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情况下得到较好的实施。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1957—1978年）

鉴于苏联问题“揭盖子”和“一五”计划后期诸多问题的暴露，为更好地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党中央探索出苏联模式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在其指导下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一条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

复杂的历史背景、特定的思维方式和独到的理论特色，使这一道路在基础、主体、保障、绩效方面具有以下20点内容：（1）在总体依据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始终发挥着指导作用；（2）在具体理论上，以苏联工业化理论的中国化形式为具体指导；（3）在建设目标上，由开始时的三个现代化逐步升级为四个现代化；（4）在建设载体上，由“大跃进”先后变为备战计划、“洋跃进”；（5）在建设重点上，由“以钢为纲”先后变为国防军工、基础工业；（6）在建设路径上，尝试了一系列并举的“两条腿走路”方针；（7）在建设动力上，总体延续了拔高生产关系和进行阶级斗争的方法；（8）在资源特色上，试图通过群众运动用劳动力进行替代；（9）在推进方式上，呈现出显著的外延粗放型特征；（10）在体制依托上，两次实践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分权模式——毛泽东“虚君共和”体制构想；^[7]（11）在经济成分上，除调整时期外，总体坚持了单一公有制；（12）在分配方式上，总体坚持了单一按劳分配；（13）在资源配置上，总体坚持了中央与地方的指令性计划；（14）在对外关系上，总体呈现出“反两霸”的特征；（15）在区域政策上，延续了此前均衡发展的方针；（16）在经济增速上，在横向和纵向对比中都属相对慢速增长；（17）在经济波动上，呈现出“低位/大起大落”的特征；（18）在产业结构上，总体呈现出严重不协调的特征；（19）在生活水平上，不仅贫困，且改善甚缓；（20）在发展质量上，效果较差、质量较低。

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推进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1）初始极端化阶段——“大跃进”时期。在农业改造、反右运动、反“反冒进”中，毛泽东找到通过中央与地方“两条腿走路”来加速推进现代化的路径，并由此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的转轨。由于对钢铁工业重要性的片面认识和非常做法，当时出现这一道路初始的极端化推进阶段——“大跃进”，并最终使其变为大灾难。（2）被迫暂停与局部纠偏阶段——调整时期。虽然经过三个阶段的调整后国民经济不仅全面好转，还探索出“三自一包”“吃穿用”计划和“四化”目标等成果，但这都是充分肯定总路线的前提下所做的局部纠偏。（3）特殊推进阶段——备战时期。鉴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我国从“三五”计划开始大规模进行以国防军工为重点的大小“三线”建设。（4）调试改进阶段——“洋跃进”时期。由于备战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进行调整恢复的同时，党中央试图通过大量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来以“新跃进”的方式实现以往的诸多经济规划和目标。虽然这一尝试仅开了个头便结束了，但仍对这两年和此后的国民经济造成不少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除上述内容外，这一道路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从总路线的内涵看，“鼓足干劲”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力争上游”是要努力走在

世界前列；“多快好省”体现了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的统一。从结构看，“鼓足干劲”和“力争上游”是手段；“多快好省”是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是目标。^[9]从实质看，总路线既体现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的。从灵魂看，“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10]从方法看，工业与农业、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是试图通过群众运动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来加速实现现代化。从前述表中不难看出，总路线的上述核心要素贯穿1978年前除调整时期外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第二，这一总路线的内生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的不科学性。首先，主要矛盾与根本任务存在矛盾。主要矛盾决定根本任务。虽然毛泽东在1957年将党的八大确定的主要矛盾恢复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但他却将实现工业化作为这一时期的根本任务，并据此提出了相关的总路线和现代化道路。这就导致此后党的中心工作不断受到阶级斗争干扰并最终转移到阶级斗争上。其次，主观意愿与客观规律存在矛盾。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力争上游”，总路线将“鼓足干劲”作为方法，试图在拔高生产关系和进行阶级斗争的推动下，通过群众路线和“两条腿走路”来实现现代化。这不仅违背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第三，要素投入比例的硬约束与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是造成苏联工业化理论中国化的成果——“积极平衡”理论存在重大谬误和这一总路线诸多内生矛盾的理论原因。为有效落实总路线的要求，毛泽东用“积极平衡”理论取代了此前的苏联工业化理论。对此，他指出：“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所以“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11]这就意味着，生产中要“向先进的定额看齐”“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12]不难看出，这是要从过往以短缺要素为标准进行平衡，变为以“过剩”要素为标准进行平衡。虽然生产要素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在既定科技水平下的替代比例是有限度的，即存在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

四、改革开放时期现代化道路（1979—2012年）

1978年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我们党逐步探索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其基本路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鉴于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使命任务、具体理论等皆有所不同并由此造成诸多差异，所以可以2012年为界划分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道路。

在时代特征和指导理念等的综合作用下，新时期现代化道路在基础、主体、保障、绩效方面具有以下20点内容：（1）在总体依据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发挥着总体指导作用；（2）在具体理论上，邓小平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具体指导工具；（3）在建设目标上，明确为现代化；（4）在建设载体上，由温饱先后升级为总体小康、全面小康；（5）在建设重点上，由劳动密集型升级为资本密集型产业；（6）在建设路径上，提出并践行“两个大局”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发展思路；(7)在建设动力上，持续推进市场化改革；(8)在资源特色上，由引进吸收走向自主创新；(9)在推进方式上，由外延粗放型向内涵集约型转变；(10)在体制依托上，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1)在经济成分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12)在分配方式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13)在资源配置上，逐步确定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14)在对外关系上，由政策性开放走向制度性开放；(15)在区域政策上，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转变；(16)在经济增速上，呈现出快速增长的特征；(17)在经济波动上，呈现出“高位/平缓”的特征；(18)在产业结构上，逐步走向比较协调；(19)在生活水平上，由贫困先后升级为温饱、总体小康；(20)在发展质量上，效果较好、质量较高。

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推进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解决温饱时期。这一时期，党中央一方面通过实施“新八字方针”开始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另一方面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的大门，同时还拉开了对外开放的大幕，经济发展局面由此焕然一新，并于1987年提前实现温饱目标。(2)解决总体小康时期。虽然这一时期先后遭遇价格“闯关”失败、治理整顿影响、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但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的带动下，世纪之交我国不仅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还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9](3)接力解决全面小康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主导产业由前一阶段的建材、电子、新一代家电等，逐渐向汽车、房地产、IT产业等过渡；另一方面，随着加入WTO，我国进入全方位的制度性开放阶段。

除上述内容外，对这一道路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贯穿和指导着“三步走”战略中的每一步，从根本上保障了1978年以来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基本路线是执政党根据国家的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而提出的总揽全局的行动纲领，^[10]其功能和作用相当于此前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78年以来形成的这一基本路线，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依据，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概述了党在初级阶段的总路线和总任务。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路线贯穿和指导着“三步走”战略中的每一步，从根本上保障了1978年以来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

第二，总体顺应和符合了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理论的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务实管用和新时期现代化道路切实可行的理论原因。根据我国人多地少、一穷二白的国情，自然应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因如此，1978年，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并着手分步解决温饱等问题后，显然就符合了当时我国劳动力充裕而资本、技术稀缺的资源禀赋特点。正是在此基础上，我国不仅提前解决了温饱问题，还在解决“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问题的过程中先后两次实现资源禀赋优势的升级，从而在静态比较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和主导产业更替。事实上，这种升级过渡对“三步走”战略的顺利实施和温饱、总体小康、全面小康主要指标的分步完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新时期现代化道路不仅在内涵上开始契合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而且在其推进的几

个阶段都呈现出历史性与发展性的统一。与此前相比，这一现代化道路最突出的特征不仅是注重强国，还尤为强调富民。温饱、小康、现代化不仅是以一种生活水平来形象地表达发展层次和建设目标，而且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过程，从而与国际上现代化建设的一般演进轨迹趋于一致。事实上，“三步走”战略的每一步都以富民强国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使其在内涵上开始契合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不仅如此，这一道路所经历的三个阶段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条件下形成并被推进的，都被打上了如前所述的历史烙印。此外，它们还都具有与时俱进的发展性。如解决温饱问题时产生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解决总体小康问题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又产生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脱节的问题，解决全面小康问题时则试图解决这一新问题。

改革开放时期现代化道路是重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与我国具体实际结合并与时俱进创新后的成果。其实质是努力将我国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与一般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文明发展方向进行契合对接，从而确保在与人类共同价值目标融合的过程中实现民族复兴。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道路（2013—2021年）

2012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时代特点、主要矛盾、使命任务等进行了新的研判，在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对现代化建设进行了新的安排和部署，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道路。

新时代现代化道路在基础、主体、保障、绩效方面具有以下20点内容：（1）在总体依据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继续发挥着总体指导作用；（2）在具体理论上，新发展理念是具体指导工具；（3）在建设目标上，强调全面现代化；（4）在建设载体上，由全面小康向基本现代化升级；（5）在建设重点上，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升级；（6）在建设路径上，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7）在建设动力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驱动力；（8）在资源特色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9）在推进方式上，日渐体现为内涵集约型；（10）在体制依托上，深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1）在经济成分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12）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13）在资源配置上，明确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14）在对外关系上，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5）在区域政策上，要求协调发展；（16）在经济增速上，保持中高速增长；（17）在经济波动上，保持“高位/平缓”的特征；（18）在产业结构上，比较协调；（19）在生活水平上，由总体小康升级为全面小康；（20）在发展质量上，效果较好、质量较高。

截至目前，这一现代化道路的推进经历了如下两阶段。第一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复杂环境下，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稳

中求进的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经济建设取得新的成就，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并由此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许多新要求，²¹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第二阶段，党的十九大以来的四年。随着2018年中美贸易纠纷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愈发突出，不少国家的民粹主义势力抬头，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在习近平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脱贫攻坚任务圆满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顺利实现。

除上述内容外，对这一道路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新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新进程中时代化、应用化、具体化的产物，是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方法和行动指南。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理论成果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1]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具体来说，创新解决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解决的是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解决的是内外联动问题，共享解决的是公平正义问题。

第二，要根据新时代基本国情的“变”与“不变”，准确把握新阶段现代化建设的内涵与特征。新时代以来，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是“一个变化了”和“两个没有变”，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②这种“变与没变”，体现了永恒发展的绝对性与阶段稳定的相对性的辩证关系。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并非静止不变、停滞不前，而是一个动态变化、阶梯上升、不断发展的量变积累过程。这就既需要继续立足于初级阶段的现实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也需要根据变化了的主要矛盾，将新时代的主要任务从解决生存性问题或低层次物质满足问题，转移到解决高质量发展欠缺及结构性矛盾问题上，^[2]也即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上来。因此，在新阶段的现代化建设中，应根据基本国情的这种“变”与“不变”，准确把握现代化建设内涵与特征的变化，切实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第三，对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完善，是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难以有效深入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未能有效提升的深层原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改革公共政策的产生、执行、调整方式来更好地与市场导向相协调，以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对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和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致使不少党政部门多年来屡屡充当经济活动的主角，在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创新等要素方面，尚存在明显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干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显而易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道路是根据新阶段、新矛盾、新目标、新任务

而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架构、战略部署、布局安排等进行创新升级的结果，有力确保了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良好开局。

六、经验启示

第一，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变迁的社会历史范畴。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是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全面社会变革，因此是一个系统变迁的社会历史范畴。它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和特征，到目前为止尚无统一的现实标准。^[13]从历史看，由于近代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欧美等先行发达国家为价值目标，因此现代化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但并不等于或专属西方化。从现实看，现代化日渐成为一个全面系统的工程，其内涵获得不断扩展和丰富，目前一般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人的现代化等。其中，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基础，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根本保证，^[14]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有力支撑，社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生态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长久保障，科技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目的归宿。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由理论先进、思想坚定、组织坚强、作风优良、领导有力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现代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不仅其本身需要理论先进、组织坚强、领导有力的政治组织来推进，而且对因利益关系调整而可能遭遇的各方面阻力和困难，也只有靠思想坚定、作风优良的政治组织才能有效解决。我国近代以来农民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的种种尝试，皆因领导力量的内部原因和外部条件制约而屡失现代化机遇。^[15]直到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才真正开启了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此，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道路百年探索的首要根本经验。^[16]

第三，在党的百年探索历程中，五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都始终贯穿一个不变的初心使命和共同的价值追求。虽然在历史背景、内涵特征、推进情况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别，但从前文不难看出，百年来的五种现代化道路都贯穿一个不变的初心使命和共同的价值追求，即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无论是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还是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抑或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化道路，都是不同历史阶段和经济水平下对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诉求。可以预见，无论今后在实现基本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进程中遇到什么问题，这一初心使命和价值追求都不会变。

第四，应与时俱进地拓展深化对现代化的认识。由于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所以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渐进丰富、逐渐成熟的过程。鉴于其核心和基础是工业化，所以毛泽东多次强调必须将中国这一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过渡时期现代化道路虽然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当时已认识到这是不够的。为此，周恩来指出：“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不是说把一切力量都摆在重工业上，其他的都不搞了”“因为重工业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随后^⑨，他又于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他首次提到四个现代化问题。鉴于认识的深化，1978年后，我们党一方面逐步用“中国式现代化”来代替“四个现代化”，以降低过高的阶段性目标；另一方面，持续探索现代化的科学布局，从初始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发展到新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并在新时代侧重关注政治、社会现代化的同时，强调以人为中心和全球关怀的内外双重价值取向。^[17]同时，党中央还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大大推动现代化由局部、浅层向全面、纵深发展。

第五，能否在立足我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遵循产业演进一般规律，直接关系到今后全面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能否顺利实现。国情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现代化必须在立足各自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遵循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新民主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在20多年革命和局部执政实践中，将国外现代化先行国家的一般规律与根据地和解放区建设实际相结合，并经分析总结与归纳提炼后的产物，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并且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体制集权模式过渡的渐进性，所以过渡时期现代化建设才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原则下得到较好的实施。1978年后，两种现代化道路的先后形成和“三步走”战略的分步实施，则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貌焕然一新。事实证明，能否在立足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遵循产业演进一般规律，直接关系到今后全面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能否顺利实现。

第六，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科学稳妥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这一经济体制核心问题的正确选择。从党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历程中可以看出，哪种现代化道路下的市场机制运行较好，这种现代化建设就执行得较好，反之亦然。这是因为，市场的调节作用不仅会使政府获得比行政指令外更准确的信息，还可以使企业等市场主体因接收到准确信息而有效避免预算“软约束”。当然，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市场的不足也需要政府来及时补充，尤其在教育、医疗、养老、权力等领域，其过度市场化问题需要政府今后加大矫正力度。因此，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科学稳妥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正确选择。

第七，党全面执政前30年两种现代化道路的先后选择，为后40余年及今后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既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也提供了难得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虽然1978年前的现代化建设出现不少挫折，但仍使我国取得了骄人成就。值得指出的是，前30年的相关实践为此后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经验。仅以“大跃进”和备战期间计划经济体制的两次分权为例，虽然为配合“大跃进”和备战而进行的体制下放带来不少问题，但却解构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集权模式——苏联式中央高度集权型体制，初步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毛泽东“虚君共和”体制构想模式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和地方大力发展工业的局面，从而为1978年以后的市场化增量改革创造了条件，避免了后来苏联“休克疗法”式的灾难性改革。此外，这两次体制下放和分权失败的教训说明，在不改变单一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的前提下，只寄望于通过权力收放来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是不可能的，这就为1978年后的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反面经验。事实上，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重要原因。

第八，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变革效果，最终应以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更为具体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来衡量与检验。为充分发挥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与经济基础的促进作用，1978年前，我们党一方面通过“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向单一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的基本经济制度过渡；另一方面，又先后提出“抓革命、促生产”和“抓纲治国”等口号，试图通过阶级斗争和人的思想革命化来推进战略实施。但这种超越国情和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与之相反，1978年后，我们根据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和一穷二白的国情，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诸多环节；另一方面，通过对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相关制度和各类组织的创新发展，来促进经济基础与生产力的健康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外经济史都一再证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并不完全取决于主观愿望，人们只能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去做在规律允许范围内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事情。正因如此，邓小平才于新时期在实践标准的基础上提出生产力标准，并进而将其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事实证明，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科学认识一切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根本视角，也应成为衡量检验现代化道路绩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根本标准。☆

注 释：

①由于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所以1978年前一般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0、1082页。

③《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7页。

④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52页。

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6页。

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人民日报》1953年9月25日，第1版。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0页。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98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1页。

⑩《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6页。

⑪《力争高速度》，《人民日报》1958年6月21日，第1版。

⑫《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4页。

⑬《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第1版。

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0页。

⑮《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59页。

主要参考文献:

- [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程组,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5.
- [2]郑崇玲. “七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道路的开拓[J]. 闽江学院学报, 2007(3):61.
- [3]任志江.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模式的历史互动与历史启示[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8.
- [4]林毅夫,等. 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28-30.
- [5]任志江,赵德馨. 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变迁研究[J]. 社会科学, 2021(2):149.
- [6]任志江,赵德馨. 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变迁研究[J]. 社会科学, 2021(2):150.
- [7]任志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虚君共和”经济体制构想的渊源和实质研究[J]. 科学社会主义, 2009(6):140.
- [8]张作云.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历史性飞跃——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到科学发展观[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2008(1):8.
- [9]任志江,等. 邓小平“总体小康”思想基本特征探讨[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2016(1):69.
- [10]杜玉华. 论新时代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内在统一[J]. 探索, 2019(1):8.
- [11]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N]. 人民日报, 2015-11-4(1).
- [12]李杰. 论习近平新时代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创新建构[J]. 经济学家, 2020(1):25.
- [13]舒磊. 习近平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新阐释[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8(2):7.
- [14]鲁俊海,吕欢. 论中国现代化的特点与世界意义[J]. 时代经贸, 2011(22):1.
- [15]李晓燕,等.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启示[J]. 理论导刊, 2005(2):51.
- [16]刘丽敏.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J]. 红旗文稿, 2019(8):13.
- [17]张帅,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的整体性探析[J]. 宁夏党校学报, 2019(5):59.

The Centennial History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CPC's Exploration on Modernization

Ren Zhijiang¹ Liu Yuwei² Deng Hui³

Abstract: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explored five different ways of modernization, among which, the new-democratic modernization, is a unique creation that combine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general laws of world modernization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a.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is an “imported model” that comprehensively learns the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methods.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s an ideal way that tries to combine the core of the Soviet Union industrialization with China's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practical needs. The modernization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 a new era means to ensure that China's modernization is achieved in the process of merging with the common value of mankind by aligning with the general law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world civiliz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the result of innov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overall structure, strategic deployment, and layout arrangement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ew stage, new contradictions, new goals, and new mission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Modernization; Centennial History;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刘宇浩)

收稿日期:2021-03-20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